

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青年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梁海艳¹, 阳茂庆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2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昆明 650092)

摘要: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 使用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对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作了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 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从通婚圈角度看, “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

关键词: 城市青年; 意愿通婚圈; 现实通婚圈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1668(2014)03 - 0043 - 09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Urban Youth Inter-marriage Circle Chan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Youth Situation Survey Data

LIANG Hai-yan¹, YANG Mao-qing²

(1 School of Sociology &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rticle uses th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ese City Youth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data,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turn analysis method research on the urban youth of geographical intermarriage circle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population migration experienc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ity unmarried youth’s willing intermarriage circle and married youth’s reality intermarriage circle expanded, we also found that one-child of urban youth intermarriage circle obviously smaller than non one-child, but intermarriage circle does not due to sib’s amount. The “Two Children”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hould be the destiny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Key words: urban youth; willing intermarriage circle; reality intermarriage circle

收稿日期: 2014 - 01 - 16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研究》(14XNH093)、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四二一”家庭结构现状与和谐社会构建》(08BK004)和博士基金项目《云南边境地区境外回流人口生存状况调查研究》项目的资助。本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宋健教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所有成员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 梁海艳(1986—), 男, 云南曲靖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与社会发展; 阳茂庆(1976—), 男, 湖南永州人,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

1 引言

通婚圈指个体选择配偶的范围,包括可能选择的地域范围和群体范围。一般可以从地理距离(通婚半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韦美神 2008;李晓霞 2004)。李若建(1992)认为在制度性的择偶中,择偶范围被称为通婚圈,并将其分为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翟振武和段成荣(2006)认为分析夫妻户口登记地情况也可以看出通婚圈的大小。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只能从配偶或者意愿中的配偶家庭所在地与本人家庭所在地是否跨越某一行政区域来度量通婚圈的大小,本文通婚圈是指地域范围。

国外在研究婚姻匹配时提出趋同论,认为个体趋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种族等属性相近的异性为配偶。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也认为“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古德,1986)。法国1990年290万移民组成的家庭中,有1/3以上已经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双方均为移民的则多数为族内婚(即夫妻双方均来自同一国家),其婚配概率为90%(王家宝 2005)。

国内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通婚圈发展态势判断、变化原因和社会影响。通婚圈发展态势存在四种判断。第一,通婚圈扩大。代表学者有:段成荣(2003)、刘传江(1991)、王金玲(1992)、黄佩芳(2004)、李富强(2000)、史清华(2001)等。第二,通婚圈缩小。代表学者有:邱泽奇,丁浩(1991)、吴重庆(1999)、新山(2000)等。他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区域快速内卷,通婚村减少,婚入和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第三,通婚圈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代表学者:雷洁琼(1994),其1987-1988年对全国6省市2799个农民进行户主与其配偶婚前两家的距离调查发现,近距离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年龄组通婚圈大致相同。最后,通婚圈呈现扩大与内卷并存的局面。唐利平(2005)认为农村通婚圈总体比较狭小,但有扩大也有缩小的情况,通婚圈的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一样经历着转型的过程。韦美神(2008)认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通婚圈出现“内卷”和“扩大”共存的现象。

通婚圈演变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但二者在不同地区影响不一致。马宗保、高永久(2005)等对宁夏通婚圈的研究发现,通婚圈会受到所在地区的生活条件影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有利于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促使婚配对象选择的空间也增大(曹锦清 2001)。邓智平(2004)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迁移流动席卷了全国,人们交际圈的迅速扩展,使得通婚圈也逐渐扩大。人口迁移流动对人们的婚姻和生育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寻找配偶和维持婚姻关系稳定性方面的困难(王丰等 2011)。

通婚圈扩大的影响表现在:大范围的跨省通婚可以简化婚礼仪式、节约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姻亲关系(宋丽娜 2010)。通婚圈扩大可能会形成骗婚现象,迁移流动范围扩大,双方了解很少,婚姻风险更大(杨爱民,刘善来,1994)。此外通婚圈扩大对女性婚后社会适应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赵建国 2012)。王家宝(2005)认为在上海光棍汉喜笑颜开的同时,外地光棍汉却愁眉苦脸,上海市娶了外来妹使得阴阳趋于平衡,但是某地的男女比例必然会更加失衡。通婚圈缩小带来的影响表现在:有研究认为若通婚距离太小也会对后代的遗传素质产生影响,可能因为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过度摄入而导致发育不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何校生,1995)。

纵观已有的研究发现,通婚圈变化态势判断出现了很大分歧,但认为通婚圈在扩展的观点是主流。出现判断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村或者局部区域来分析,而很少从城市和全国范围来研究,关于原因的分析也主要从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简要地泛泛而谈,有关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是定性的描述,而很少通过定量方法来深入研究。在我国乡村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从城市区域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到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上来。

2 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11月14日-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北京等地抽样调查。由于该调查依托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

目来完成,所以调查区域主要选择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独生子女比例(31.58%)比较接近的河北省、湖北省和陕西省三个省,进一步选择与各省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北京因地缘优势和直辖市特性被补充进来。最后确定调查区域包括北京7个城区、河北省保定市16个街道、湖北省黄石市11个街道、陕西省西安市13个街道。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本文“青年”年龄界定为20-35岁)。样本量3832,其中北京820,黄石829,保定813,西安820,四个省市样本量基本均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就业与经济状况、婚姻与情感、生育意愿与行为、家庭成员及关系几个方面。经课题组对原始数据清理检验,改正错误数据,删除无效数据,该数据质量比较高,同时四个城市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分析数据均来自该调查。

2.2 方法说明

本文首先采用常用的单变量描述统计和双变量交叉分析,此外在已有通婚圈研究成果和双变量交叉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回归模型以进行推断统计。由于未婚人群的通婚圈调查只是一个主观意愿,与未来的实际通婚圈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在此将城市未婚青年的通婚圈定义为“意愿通婚圈”,相应地将已婚者通婚圈定义为“实际通婚圈”,分别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意愿通婚圈、实际通婚圈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把握通婚圈的发展变化趋势。

表1 城市青年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婚姻状况		
男	1291	39.34	未婚	1631	49.70
女	1991	60.66	初婚有配偶	1627	49.57
出生年份			再婚有配偶	8	0.24
1975-1979年	1028	31.32	离婚	15	0.46
1980-1984年	954	29.07	丧偶	1	0.03
1985-1989年	1300	39.61	意愿通婚圈(未婚)		
受教育程度			同一市/县	890	55.69
未上过学	4	0.12	同省不同市/县	54	3.38
小学	40	1.22	不同省	19	1.19
初中	641	19.53	无所谓	633	39.61
高中/中专	1124	34.25	其他	2	0.13
大专	900	27.42	小计	1598	100.00
本科	531	16.18	现实通婚圈(已婚)		
研究生	42	1.28	同一市/县	1251	75.77
户口性质			同省不同市/县	264	16.00
农业	774	23.58	不同省	136	8.00
非农业	2508	76.42	小计	1651	100.00
迁移流动			与初婚配偶的结识途径		
无	2196	66.91	在学习或工作中相识	598	36.00
是	1086	33.09	朋友介绍或通过朋友认识	871	53.00
兄弟姐妹情况			父母介绍或通过家人认识	140	8.00
有(非独生)	1808	55.09	在目的性的社交活动中认识	32	2.00
无(独生)	1474	44.91	其他途径	1	0.00
合计	3282	100.00	网络	9	1.00
			小计	1651	100.00

原始的意愿通婚圈变量总共分为5类,分别是希望配偶家庭所在地与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县/市”、“2=在同省不同县/市”、“3=在不同省份”、“4=无所谓”、“5=其他”;但只有两个被调查者选择了“其他”,该类单元格频数太少,因变量的变异很小,为了避免影响结果的可信性,所以将其从模型中剔除。这样,意愿通婚圈模型中的因变量最终只有前4类。

实际地域通婚圈测量共分为4类,分别是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与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县/市”、“2=在同省不同县/市”、“3=在不同省份”、“4=其他”,但在有效样本中没有选择“其他”选项,所以实际地域通婚圈模型结果只有前3类。因为因变量不论是意愿通婚圈还是实际通婚圈,其取值都在3~6个之间,所以选择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比较合适。

3 城市青年基本特征与通婚圈发展变化

目前有关通婚圈的研究主要以农村为切入点,而专门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且从农村研究得出的结论分歧较大,在流动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不仅对农村青年的择偶行为产生了影响,对

城市青年择偶行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以城市为切入点对中国通婚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3.1 城市青年的基本特征

从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样本来看,女性青年偏多,每一年龄队列的女性青年都比男性人数多,样本性别比仅为65,明显低于总人口性别的正常值域(95-102),年龄结构以20-24岁(1985-1989年出生队列)较多。从图1可以看出低龄青年和高龄青年较多,而中间年龄段的青年人口较少,2009年四城市青年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如图1所示。

由于该调查对象的居住地特性和年龄特性,样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同时由于该调查区域为城市,所以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也较高,占3/4左右,而农业户口只占1/4左右。从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来看,大概只有1/3的城市青年有过流动,2/3的城市青年从来没有过流动,一直居住在本地。婚姻状况中未婚和初婚各占一半,再婚、离婚和丧偶几乎没有,三者合计不到1%。我们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将通婚圈分为意愿通婚圈和现实通婚圈。所谓的“意愿通婚圈”主要是针对未婚群体而言,根据他们对未来配偶家庭所在地的期望进行判断。对意愿通婚圈的分析可以掌握未来通婚圈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方向。“现实通婚圈”是针对已婚城市青年而言,根据他们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来确定。尽管二者的对象不一样,没有直接比较意义,但从总体上可以看出未来通婚圈可能的变化情况。通过比较意愿通婚圈与现实通婚圈发现,未来城市青年的通婚圈会有扩大的趋势,未来小范围的同县市通婚圈比已经形成的同县市通婚圈比例较低,而大范围的跨县市甚至跨省比例可能增加。未来城市青年的通婚圈变化可能趋于扩大。从城市青年结婚相识的途径来看,主要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或者在工作或学习中认识的,而其他途径所占的比例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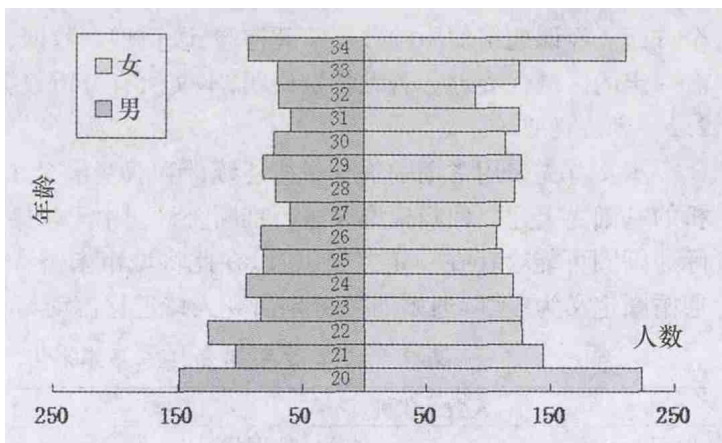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青年状况调查人口金字塔(单位:人)

3.2 城市青年通婚圈的变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日渐活跃。开始主要是以乡镇企业为目的地的就近就地转移,即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钟摆式流动,这是人口流动的第一次浪潮。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80年代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活跃,他们不仅限于老一代的就近就地临时性转移,而是常年外出到沿海发达地区,这是第二次流动浪潮。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又出现了长期性的举家式迁移,由单个劳动力外出向举家式迁移转变,他们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比较长,2013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平均居留时间超过5年,这是我国人口流动的第三次浪潮。人口流动出现三次浪潮,除在流入地居留时间延长外,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流动地域范围和距离也在不断向外扩展,而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城乡交流趋于频繁。目前正处于婚龄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涉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直接进入城市,经历打工经济生活。在多年的外出流动中,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结识了很多异地朋友,而且这种朋友圈子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不断放大青年的社会关系网,而这种关系网的扩散效应不仅仅表现在流动人口内部,也展现在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之间,城市青年人口的圈子也会得到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必然会对未婚青年的择偶范围产生影响。从此次调查的数据来看,自90年代以来,城市青年的跨省通婚在稳定增长。中国90年代—2010年城市青年不同初婚年份的地域通婚圈变化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城市青年同县市和同省跨县市通婚比例都在降低,而跨省通婚比例在持续稳定地增加。从20世纪初到2010年,十年内跨省通婚的比例由5.61%迅速增长到14.29%,那么为什么城市青年

通婚圈会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 下面将进一步对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分析。

4 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城市青年迁移流动与通婚圈的关系

人口迁移流动最明显的变化是人口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变动,与此同时还会带来很多附带社会关系的变迁与交叉。比如居住圈的邻居关系、工作圈中的同事关系、娱乐圈中的朋友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在家为兄弟姐妹或朋友关系,到了流入地可能变成同事关系。

人际关系的变迁与交叉,对未婚青年的择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次调查资料反映:城市青年结婚认识的途径来主要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或者在工作或学习中认识,由此可以推断迁移流动必然会促进通婚圈的扩展。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外出务工经商占了很大的比例。笔者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数据计算也发现,88%的流动人口本次外出原因为务工经商。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动人口外出基本都是为了获取一份工作,同时在工作中又可以结识很多异地的朋友,况且很多流动人口直接与流动中认识的异性朋友恋爱结婚,或者是通过流动中认识的朋友给自己介绍对象。因此,随着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和流动地域范围的扩大,通婚圈也会随之扩展。下面结合“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是否有过迁移流动与地域通婚圈的关系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城市青年通婚圈与迁移流动的关系(单位: %)

意愿通婚圈(未婚群体)		同一市/县	同省不同市/县	不同省	无所谓	其他
迁移流动	显著性检验	Pearson chi2(4) = 105.9921 P = 0.000				
	没有	64.68	2.27	0.66	32.29	0.09
	有过	38.19	5.54	2.21	53.87	0.18
	合计	55.69	3.38	1.19	39.61	0.13
现实通婚圈(已婚群体)		同一市/县	同省不同市/县	不同省	无所谓	其他
迁移流动	显著性检验	Pearson chi2(2) = 145.3593 P = 0.000				
	没有	84.55	10.78	4.67		
	有过	57.62	26.77	15.61		
	合计	75.77	15.99	8.24		

迁移流动经历的偏高。这说明迁移流动对城市青年的通婚圈扩展起到促进作用。从现实通婚圈的差异中我们更能体现迁移流动的效用: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其跨省通婚的比例是没有流动经历的3倍多。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

4.2 城市青年家庭成员与通婚圈的关系

婚姻不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之间的联合。因此,个体婚配对象的选择除了婚姻当事人以外,还会受到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父母包办”婚姻几已成为过去,但父母对子女婚姻的选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父母虽然失去了儿女婚姻的决定权,但没有放弃“参谋权”,父母比其他家庭成员对子女结婚对象的选择影响要大。有的父母比较反对远距离的通婚,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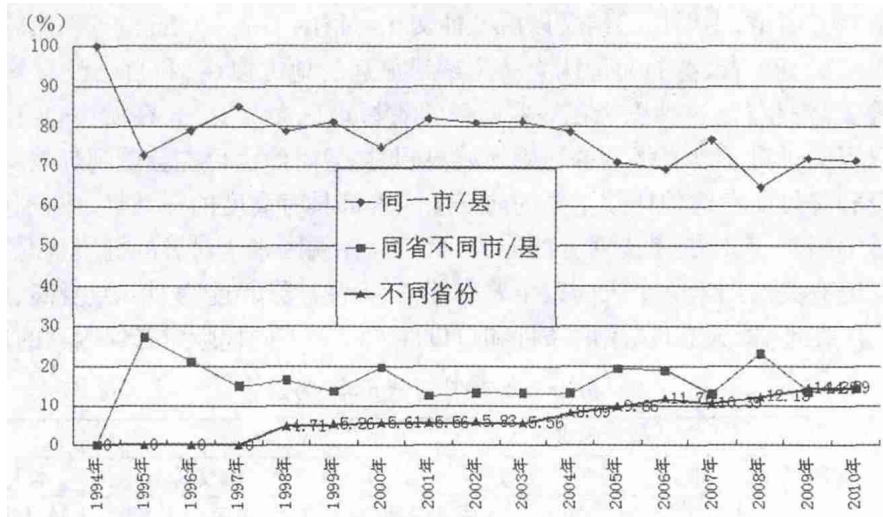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青年不同初婚年份地域通婚圈变化

表2统计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无论是对初婚者的现实通婚圈还是对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与自己在同一个县市的比例均比没有迁移流动经历的低,相应地,其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与自己在同省但不同县市和跨省份的比例均比没有

是跨省通婚,主要担心结婚以后各种文化习俗的不适应、语言不通、家族成员交往不方便,导致姻缘关系弱化等。更有甚者,有的父母认为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以后,和自己没有养育女儿一样,在他们看来,“远嫁”就等于“没生”。这种思想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在城市也存在,有的家庭还因此闹得不和睦。所以当父母对子女有强烈的通婚地域限制时,通婚圈也可能受到影响。从此次调查资料来看,城市青年人本身和父母所考虑的比较重要的前三个因素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代际都把对方的人品作为择偶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考虑对方的能力,第三个择偶因素是对方的健康状况。择偶因素既包括个体因素,也包括与家庭有关的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有性格、人品、学历、能力、年龄、身高、外貌、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所在地、家人态度、家庭条件和户口性质等。不同代际对择偶因素的选择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城市不同代际择偶因素(单位:人,%)

择偶因素	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				第三因素			
	本人		父母		本人		父母		本人		父母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格	568	35.54	340	21.30	110	6.93	53	3.53	76	4.90	64	4.45
人品	691	43.24	641	40.10	461	29.03	302	20.10	78	5.03	96	6.67
学历	48	3.00	52	3.25	124	7.81	108	7.19	65	4.19	40	2.78
能力	77	4.82	84	5.26	381	23.99	269	17.90	275	17.70	127	8.83
经济状况	61	3.82	140	8.76	174	10.96	252	16.78	224	14.40	197	13.69
年龄	11	0.69	15	0.94	48	3.02	61	4.06	50	3.22	50	3.47
外貌	86	5.38	33	2.07	122	7.68	88	5.86	222	14.30	93	6.46
身高	13	0.81	19	1.19	46	2.90	27	1.80	46	2.96	51	3.54
户口	2	0.13	4	0.25	7	0.44	19	1.26	19	1.22	28	1.95
健康	22	1.38	48	3.00	72	4.53	121	8.06	294	18.90	267	18.60
家庭所在地	1	0.06	46	2.88	2	0.13	48	3.20	19	1.22	77	5.35
家庭条件	13	0.81	83	5.19	23	1.45	133	8.85	132	8.51	264	18.40
家人态度	1	0.06	7	0.44	18	1.13	21	1.40	52	3.35	84	5.84
不清楚	4	0.25	86	5.38	0	0.00	0	0.00	0	0.00	1	0.07
合计	1598	100.00	1598	100.00	1588	100.00	1502	100.00	1552	100.00	1439	100.00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代际就择偶首要考虑的几个因素而言比较一致,但在其他方面的因素却存在一些不同,其中对家庭所在地的考虑两代人之间有所不同,父母一代比子女一代考虑得更多。一般情况是,父母一代的思想趋于保守,希望子女选择配偶时考虑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对象,

尤其是父母对女儿的对象选择更为明显。父母不放心把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就没有能力去看女儿,女儿也没有时间和金钱频繁地回家探望父母。就子女本身而言,对配偶的家庭所在地的考虑可能受到较少限制,他能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配偶的能力、人品、健康等个人因素。人口在迁移流动之后,他们与家庭的互动和联系就会大大削弱,在流入地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交往的对象也主要是同辈群体。而随着人际关系变化与更新,青年人受父母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就会随之减弱,而受同辈群体的影响会更为迅速。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映射到青年人的潜意识中,促使他们不断调适自己原有的行为,他们的婚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家庭成员对婚姻的影响,除父母外最重要的就是兄弟姐妹的影响了。兄弟姐妹的看法和建议,有时候甚至比父母的影响力更大。但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到与此相关的数据,因此还有待证实。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出生顺序也可能会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通婚圈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兄弟姐妹数量越少,尤其是独生子女,其通婚圈可能越小。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和十分重视家庭感情纽带的环境中,独生子女的通婚地域扩展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另外,许多家庭喜欢将出生较晚的子女留在父母身边,所以出生较晚的孩子被留在父母“身边”的可能性越大,其通婚圈就会相对较小。下面将通过数据说明,如表4所示。

从表4中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已婚者的现实通婚圈,还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本人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显小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本县市内通婚的比例明显偏高,相应

地,其跨县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明显较低。但通婚圈的发展与兄弟姐妹的数量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会因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明显的变化。配偶是否是独生子女也会对通婚圈产生显著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独生子女通婚圈小于非独生子女的通婚圈,但有兄弟姐妹的其通婚圈并不会因兄弟姐妹的数量变化而有明显的差异。

表4 城市青年兄弟姐妹数量与通婚圈的关系(单位:%)

本人有/无兄弟姐妹	在同一市/县	同省不同市/县	不同省	无所谓	其他
意愿通婚圈(未婚)	Pearson $\chi^2(4) = 22.1639$ $P = 0.000$				
有	49.74	4.12	1.42	44.59	0.13
无	61.31	2.68	0.97	34.91	0.12
合计	55.69	3.38	1.19	39.61	0.13
现实通婚圈(已婚)	Pearson $\chi^2(2) = 6.9372$ $P = 0.031$				
有	73.98	17.83	8.19		
无	78.72	12.96	8.32		
合计	75.77	15.99	8.24		
兄弟姐妹数量	Pearson $\chi^2(12) = 18.0446$ $P = 0.114$				
1	50.47	3.55	1.12	44.67	0.19
2	48.63	5.46	2.73	43.17	0.00
3	48.89	4.44	0.00	46.67	0.00
4	36.36	9.09	0.00	54.55	0.00
5	50.00	0.00	0.00	50.00	0.00
合计	49.74	4.12	1.42	44.59	0.13
配偶是/否独生子女	Pearson $\chi^2(2) = 12.3371$ $P = 0.002$				
是	80.90	10.61	8.49		
否	74.00	17.85	8.15		
合计	75.77	15.99	8.24		

目前我国,特别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从我们的调查可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启示是:家庭的“二孩生育”应该成为国家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独生子女的减少可以促进通婚圈的扩展,而通婚圈的扩展又可以促进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促进地区之间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杨云彦,1992)。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二孩”的调整不仅仅是数量的调控,更是一次以数量调控为契机的、人口均衡发展战略部署。

由于城市独生子女比例比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就可适当降低城市独生子女“双独匹

配”的概率和机会。从这个角度讲,人口迁移流动也可以起到促进通婚圈扩展的作用。

4.3 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双变量交叉分析可知,城市青年通婚圈与迁移流动、是否是独生子女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仅从双变量来分析还是不够的。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即分别根据未婚者的理想通婚圈和已婚者的现实通婚圈进行模型对比,以便发现哪些因素会影响通婚圈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影响的?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同一县市的地域通婚圈作为参照类,来分析省内跨县市通婚以及跨省通婚分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现实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具有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青年省内跨县市通婚、跨省通婚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没有迁移流动相比,具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跨县市通婚高出同县/市通婚的2.94倍,跨省通婚高出同县/市通婚的4.18倍。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迁移流动仍然对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跨省通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主要与我国大规模跨省流动人口相关。城市是主要的流入地,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全国各地人口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聚集于大城市,导致城市与乡村间的物质、文化、信息人才等各种形式的交流,因此促进通婚圈的扩展。

城市青年通婚圈除人口迁移流动以外,还会受到户口性质的影响。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的城市青年选择跨县市通婚圈比县市内通婚高55%左右,但在跨省通婚中,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与户口的影响相反,在跨县市通婚中没有影响,但在跨省通婚中具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范围的通婚圈上面,与未上过学的城市青年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跨省通婚比例明显高于同县市的通婚。

表5 城市青年现实通婚圈的多项式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现实通婚圈(括号内为参照组)	相对风险比	标准误	z	P > z
同省不同市/县(同一市/县)				
迁移流动(无)	3.9447710	0.6351795	8.52	0.000
性别(男)	1.0319010	0.1552007	0.21	0.835
年龄	0.9586348	0.0206600	-1.96	0.050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0.9830705	0.0751306	-0.22	0.823
户口(农业)	1.5493970	0.3033639	2.24	0.025
本人兄弟姐妹(有)	0.9656133	0.1567106	-0.22	0.829
配偶独生子女(是)	1.6645130	0.3149571	2.69	0.007
常数项	0.0865556	0.0768284	-2.76	0.006
不同省(同一市/县)				
迁移流动(无)	5.1792330	1.1245810	7.57	0.000
性别(男)	1.1779260	0.2380874	0.81	0.418
年龄	0.9671922	0.0280809	-1.15	0.251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1.5452500	0.1519915	4.42	0.000
户口(农业)	0.7359341	0.1878034	-1.20	0.230
本人兄弟姐妹(有)	1.2791980	0.2702708	1.17	0.244
配偶独生子女(是)	1.0644690	0.2407251	0.28	0.782
常数项	0.0180593	0.0207788	-3.49	0.000

注: N = 1651, LR chi2(14) = 179.77,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 0.0768

表6 城市青年意愿通婚圈的多项式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意愿通婚圈(括号内为参照组)	相对风险比	标准误	z	P > z
同省不同市/县(同一市/县)				
迁移流动(无)	3.8094060	1.2981950	3.92	0.000
性别(男)	0.6814440	0.1941290	-1.35	0.178
年龄	0.9344183	0.0483530	-1.31	0.190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0.9256061	0.1376034	-0.52	0.603
户口(农业)	0.9965865	0.3713141	-0.01	0.993
本人兄弟姐妹(有)	0.9016407	0.2967190	-0.31	0.753
择偶因素	1.0330500	0.0645223	0.52	0.603
常数项	0.4754467	0.6814707	-0.52	0.604
不同省(同一市/县)				
迁移流动(无)	7.5456730	4.2395940	3.60	0.000
性别(男)	1.4426160	0.7302023	0.72	0.469
年龄	0.9332530	0.0814959	-0.79	0.429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1.2018030	0.2989920	0.74	0.460
户口(农业)	1.7363340	1.0939320	0.88	0.381
本人兄弟姐妹(有)	1.0353950	0.5583331	0.06	0.949
择偶因素	1.2039800	0.0866694	2.58	0.010
常数项	0.0021672	0.0053317	-2.49	0.013
无所谓(同一市/县)				
迁移流动(无)	2.5987870	0.3445501	7.2	0.000
性别(男)	0.6717941	0.0730816	-3.66	0.000
年龄	0.9772054	0.0171939	-1.31	0.190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1.1660330	0.0659603	2.72	0.007
户口(农业)	0.7850100	0.1194810	-1.59	0.112
本人兄弟姐妹(有)	0.8841406	0.1073832	-1.01	0.311
择偶因素	1.0317690	0.0257474	1.25	0.210
常数项	1.3512220	0.7285462	0.56	0.577

注: N = 596, LR chi2(21) = 140.31,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 0.0511

从模型中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仍然具有显著的影响。与配偶为非独生子女相比,城市青年的选择跨县市通婚的比例比同县市的通婚高出了66.45%,但这一点在跨省通婚上没有多少影响。

从意愿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发现,迁移流动对未婚群体的择偶圈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没有迁移流动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未来选择跨县市通婚、跨省通婚的可能性更高。在意愿通婚圈模型中除人口迁移流动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均不明显。结合已婚者现实通婚圈与未婚群体的意愿通婚圈可以归纳出:城市青年是否有过迁移流动经历对其地域通婚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结婚时是否有过迁移流动经历对通婚圈具有显著的影响,流动后结婚比流动前结婚的通婚圈明显扩大,尤其是对跨省通婚的促进更加明显。城市青年结婚对象认识的途径主要依靠朋友或通过学习工作,所以在迁移流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通婚圈会产生影响。

(2) 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其意愿通婚圈和现实通婚圈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的跨省通婚圈会进一步扩展。在择偶因素中,首要的几个因素上,父母一代和子女一代具有高度一致,主要是对方的人品、能力和健康,但在一些次要的因素上两代人之间存在差异,如对配偶家庭所在地的考虑上,父母一代要多于子女一代。

(3) 城市青年家庭中,同辈群体的观念也对通婚圈的扩展有影响,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要小,这与我

国家养老的传统和注重家庭感情的纽带有关。通婚圈的大小与兄弟姐妹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4)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没有显著的影响,但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仍然会对通婚圈产生显著的影响。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要小。

5.2 讨论与思考

基于本文分析结论,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明显偏小,而兄弟姐妹的数量增加又不会对通婚圈的扩展产生显著影响。这提示我们“二孩生育”应该是我国生育政策的最佳落脚点和最终归宿,也与人口的自然更替水平为“2”殊途同归。相关研究认为,通婚圈过小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本研究中,独生子女比例偏高不利于通婚圈的扩展,但又并不是说兄弟姐妹数量多通婚圈就大,兄弟姐妹数量对通婚圈的影响,只是在有一无之间有差别,而不在多一少之间的差别。所以可以推出:有兄弟姐妹但又不太多的“二孩生育”,既可以控制人口数量,又可以促进通婚圈的扩展,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二孩生育”是多方利益的结合点,是我国未来人口与家庭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 韦美神. 内卷与扩大: 外出务工对瑶族通婚圈的影响——以广西田东县 L 屯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6): 13-17.
- 李晓霞. 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4 (3): 22-23.
- 李若建. 人口社会学基础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68-70.
- 翟振武, 段成荣. 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 122.
- 威廉·J·古德. 家庭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86-88.
- 王家宝. 法国人口与社会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131-132.
- 段成荣等. 北京市海淀区“夫妻家庭户口异地”家庭调查研究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3 (2): 31-35.
- 刘传江. 择偶范围与农村通婚圈 [J]. 人口与经济, 1991 (4): 47-50.
- 王金玲. 浙江农民异地联姻新特点 [J]. 社会学研究, 1992 (4): 92.
- 黄佩芳. 嬗变中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及家庭结构和婚姻圈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4 (2): 35-40.
- 李富强. 壮族婚姻文化的变迁: 以田林那善屯为例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47.
- 史清华. 浙江省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来自浙江省三村的调查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4): 46.
- 邱泽奇, 丁浩. 农村婚嫁流动 [J]. 社会学研究, 1991 (3): 62.
- 吴重庆. 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 [J]. 开放时代, 1999 (4): 75-76.
- 新山.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J]. 人口学刊, 2000 (1): 33-34.
- 雷洁琼等.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42-147.
- 唐利平. 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 [J]. 开放时代, 2005 (2): 153-158.
- 马宗保, 高永久. 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与通婚圈——以宁夏南部单家集村为例 [J]. 民族研究, 2005 (2): 18.
- 曹锦清等.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332.
- 王丰, 彭希哲, 顾宝昌等. 全球化与低生育率: 中国的选择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5.
- 宋丽娜. 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 (1): 64-68.
- 杨爱民, 刘善来. “外来女”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J]. 人口与计划生育, 1994 (6): 41-43.
- 赵建国. 人的迁移与传播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46-50.
- 何校生. 达阪城的姑娘为何变丑了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995 (1): 35.
- 杨云彦. 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 [J]. 南方人口, 1992 (6): 39-42.

[责任编辑: 武继磊, 顾鉴塘]